

从封闭到开放:双向口岸驱动下近代四川外向型市场格局的空间演进(1891—1945)

和乐乐¹ 卢语²

(1. 池州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安徽 池州 247000;2. 抗美援朝纪念馆,辽宁 丹东 118000)

摘要:四川是典型的内陆省份,近代以前的市场呈现明显的内向型特征。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以区域性的土货交换为主,逐渐形成以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为主的单一化流通体系。开埠通商之后,在外部市场以及通商口岸的传导效应下,四川重塑了商品流通结构,以土货与洋货之间的双向流通体系取代了传统的单向循环,推动四川经济外向化程度显著提升,成为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在此进程中,四川依托长江航道与西南沿边各口岸逐渐形成以重庆和宜宾为双核的区域市场网络,其中,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市场推动东向开放,以宜宾为核心的川南市场主导南向开放,共同辐射四川其他市场的格局。双核协同发展打破了传统封闭式的市场格局,使四川外向型市场向更加开放的阶段迈进。

关键词:开埠通商;外向型市场;商品结构;陆海通道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1-0136-12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112

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进一步将“西部陆海新通道融入共建一带一路”^[1],标志其正式成为国家战略^[2],旨在改变“西部地区出海的格局”^[3],打破依赖长江出海的单一模式,为重庆乃至四川扩大对外开放注入新的力量。近代四川在外向型市场的空间演进过程中,所依托的长江航运与西南沿边各口岸形成的陆海双通道格局是四川构建多元化商品流通网络的早期实践,对近代四川市场外向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近代四川市场的发展演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江航道对四川市场格局重塑、市场辐射范围、城乡关系演变等的影响^[4-6],呈现单线条的研究趋势。近年来,虽有从西南沿边开放的视角研究四川市场的变迁,但多从商品外销、贸易路线的转移等层面进行探讨^[7-8],并未将其置于西部内陆地区构建双通道对外贸易网络,以及这一新通道对四川市场结构的转型影响这一层面上来。近代四川通过重庆与宜宾建构的双通道网络,其在打破封闭的地理空间与寻求多元出海通道的内在逻辑,与当今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家战略高度契合。因此对四川外向型市场格局变迁研究要关注

收稿日期:2025-10-04

作者简介:和乐乐,男,历史学博士,池州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中国近代经济史。

卢语,男,抗美援朝纪念馆(丹东市抗美援朝研究中心)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视角下近代西南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变迁研究(1889—1945)”(22XZS014);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近代安徽茶农的经济困境与生存调适研究(1870—1945)”(2025AHGXSK40076)。

长江航线与西南沿边开放双通道协同驱动的维度,这样更有利于加强对四川市场转型发展的整体认知。

一、口岸开放前的四川内向型市场格局

四川一般对市场称之为场,场镇“是一种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域空间、地理单元和经济中心地”^{[9]8}。单就场而言,“是农民、乡村手工业者进行货物交换的场所,一般设置于城外的农村,以区别于城中的市或场,多为四乡农民与乡村手工业者自发聚集兴起以交换各自所需”^{[9]8},其作为商品流通的载体,亦是城镇商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依据各层次场市的功能将四川场市划分为基层市场、地区中心市场、区域高级市场,以此为标准分析四川内向型的市场格局。

基层市场亦称为地方小市场或场镇农贸市场,“是以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为主的贸易场所”^[10]。发展至清代,“实际上已经成为土产的集散地,它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土产,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11]176}。简单来说,“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12]6}。“乡非镇则才不聚,镇非乡则利不通”^[13],是基层场市功能的真实写照。这类市场虽然容量较小,却是市场数量最多的。

乐山县“在民国共有场市 53 个,创于明代的有 6 个,清代者 34 个,道光以前的 26 个”^{[14]90-98}。三台“县属场镇 62 个,清代建立的达 44 个,乾嘉时期占 43 个”^{[15]86}。以成都所辖地区为例,“乾隆时期,成都地区共有大小场镇 51 个,嘉庆时期共有场镇 195 个”^{[16]203}。由此可见,基层场镇已经错落地分布在四川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遍及四川盆地,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活动能力的市场网”^{[4]98},为商品流通创造了良好的交易环境。

此外,在这一层级的市场中,一些场市成为专门市场,专营一种或某几种商品的交易。如崇义镇是蚕交易的重要场所,为成都十二专业场镇之一。簇桥镇是丝绸交易的重要市场,吸引着大批江西、贵州、陕西等外省商人来此购买丝绸。江油中坝是以药材为大宗的交易市场,附子“种出平武,殖在彰明,贸与江油之中坝场”^[17]。因专门市场在规模与数量上存在差异性,其在四川各地的分布情况有所不同。虽是专业性场镇,但并不排斥其他商品的流通。四川的农村集市网与“商业城镇相协调,沟通城乡市场,成为商品流通网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基础,是保障小农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环节”^[18]。

地区中心市场具有商品交易量大、基础设施完善以及交通便利的特点,是一定范围内调剂商品的中心场所,上通更高一级的市场,下连基层场镇,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地区中心市场一般位于交通要道,天然的交通运输优势赋予了市场集散与转运大宗商品的条件。如泸州地处长江与沱江的交汇处,成为自贡、犍为以及附近地区所产盐等货物的集散地。沱江沿岸各场出产的糖与其他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品大多在此集中,然后转运至重庆、万县及云南、贵州、湖南等省区的市场上进行销售,“其地交易之巨,在四川省内,除重庆外,无能及者”^[19]。乐山“城在青衣江与岷江合流处,泸水亦在县城附近,先汇入青衣江,水陆要冲,民物殷阗,商贾辐辏”^{[20]42},青衣江与岷江沿岸货物多在此集散。大多凭借交通优势建立起来的地区中心市场成为大宗货物的集散与转运市场。此类市场形成的原因并不能仅仅从交通条件来考虑,“农村场镇的支撑与大城市的引导”^{[21]63},亦是其中心市场形成的关键因素。

多功能高级市场具有交易规模大、商品种类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特点,且具有承担更大容量的商品集散与转运的能力。这类市场一般既能接受来自省内外运来的货物,又能根据市场信息将商品运销出去,长途贩运的特点比较鲜明。

成都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之地理环境优越,人口密度相对较大,成为四川重要的消费中心。“任何一个城市,除其自身所具有的条件外,还拥有其所借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定的区域经济基础”^[22]成都以“广大的川西平原为经济腹地,以周围广大地区的场镇与中小城镇为依托,广泛地吸引着大半个省区的商品”^{[23]66},成为各类商品的汇集中心。至咸丰、同治年间,“成都城乡土特产品

达成千上百种”^{[24]194}，吸引着“南北各省客商往来贸易或在成都城乡坐列贩卖”^{[24]194}。成都市场“土腴物衍，资货以藩”^[25]，流通的商品种类较为丰富，主要有“粮食、豆类、麻布、蚕丝、甘蔗、猪、牛、瓷器、炭、杂货等”^{[13]204}。这些商品除一部分由成都消费外，多转运至四川其他地区以及外省。

成都境内的水运虽不及宜宾、重庆、万县等城市发达，但境内的几条河流，颇为繁忙。“凡商贾舟楫，由大河拨换小船，直通满城”^[26]，可见各地将商品汇集于此的盛况。成都“为长江上流尽头之埠……此中商务之盛，一望可知，货物充纫，民户殷繁，自甘肃至云南，自岷江至西藏，其间数千里内，林总者流，咸来懋迁取给”^[27]。

从地理空间上看，重庆介于我国中西部的结合点上，“内接腹地，外联江海”^{[28]140}，不仅是四川与长江下游各地联系的交通要道，亦是西南地区的门户。以重庆为中心，“直接沟通了奉节、万县、涪陵、泸州、宜宾及金沙江下游、云南宣威以北地区”^{[28]141}。由于宜宾、泸州、江津、重庆等在岷江、沱江、綦江、嘉陵江的重要节点上，使“重庆与川西的乐山、成都、德阳、雅安，川中的自贡、内江，川南的宜宾、泸州，川东南的涪陵，黔江地区发生了联系”^{[28]141}。以发达的水路运输网为纽带，重庆直接间接地与四川大部分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四川至云南及至缅甸、印度，其起始点也由成都转向重庆”^{[29]336}。这一地理位置与便捷的水路运输网使重庆成为四川对外贸易的枢纽。四川境内各主要支流沿线地区的粮、盐、油、药材、皮毛、生丝等通过水路汇集到重庆，除在重庆与附近地区销售外，大多运往长江下游以及西南各省。

除此之外，这一层级市场的长途贩运以及跨省区贸易是基础市场与地区中心市场很难完成的，这种贸易形式“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拉开了商业的长链，而这一链条又链接着两个市场条件截然不同的区域，为商人们展开复杂的商业运作提供了充足的空间”^{[30]34-37}。口岸开埠前，成都已经形成了长途贩运的行商，主要负责将外地商品运入成都，亦将四川各地汇集到成都的商品向外省运销。商品流通的范围相当广泛，“北至陕西、甘肃、新疆；南至贵州、云南；东至湖北、湖南；西至川边藏区以及西藏地区”^{[24]220}。流通的主要商品有生丝、药材、绸缎、茶叶等。蜀锦“前清盛时，供全省之用，并销陕、甘、云、贵”^[26]，成都所产大黄“江广客商贩运大黄来浙”^{[31]78}，贵州银丝“已畅销成都”^{[32]266}，云南“每年购入川布，计价银二十余万两”^{[33]225}。

重庆在清前期已表现出了区域性市场大规模集散与运销的能力。当时，重庆“或贩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34]，充分发挥着其调节区域市场货物贩进运出的功能，尤其在川渝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有学者提出区域经济的结节性，即“区域内存在一个经济核心和一个互补性的外围区，核心与外围区之间存在功能一体化趋势”^{[35]4}。重庆与巴渝腹地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区域经济的结节性。

在四川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之前，已经形成了遍及省内各地的场市网，多功能高级市场依托的大商业中心是长途贩运的起落点，地方中心市场依托的中小型城镇是各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基层市场为依托的农村场市成为广大小生产者与商人联系的纽带，然后通过商人将农副产品集中到地方中心市场。“没有区域内各地市场的联系与呼应，中心市场或集市的辐射作用与吸纳作用就难以拓展，区域内各组成单位间的有机联系就难以形成。”^{[36]45}将商品生产运销的各要素连接在一起，对四川省内外贸易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的来看，口岸开埠之前，四川的商贸活动所对接的主要是省内以及周边市场，商品流通以区域性的土货交换为主，形成以粮食、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为主的单一化的流通结构，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并不密切。这种“以有易无”的传统贸易阶段，使四川市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内向型特征较为明显。市场的封闭性制约了四川对外商贸的发展，因此，四川市场要想取得高质量的发展，势必要打破这种封闭的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四川构建多元化出海通道的内在需求。

二、沿江口岸开放与川东外向型区域市场格局的形成

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川东南市场随着沿江口岸的开放,四川固有的市场体系已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四川经济中心的东移也见证了川东经济的发展。市场发展程度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至“嘉庆时期,川东地区有场 781 个,光绪时期,川东地区有 987 场,民国时期,川东地区约有 1 099 个”^[37]。嘉庆至光绪时期川东地区市场增加了 206 场,光绪至民国时期增加了 112 场,可以看出川东地区场数增速放缓,这并不代表经济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是市场整合的结果。开埠之后,在口岸的调节作用下,“逐渐减少了原始市场的成分”^[38]。川东地区作为四川东向开放的前沿,重庆开埠无疑对市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不仅与国内市场继续保持着商贸往来,更进一步与外部市场建立联系。

首先从国内市场来看,重庆开埠后,四川市场逐渐融入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进程中,与其他地区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以商品流通方面来说,相对于传统商品流通未发生很大的变化,更多表现的是区域间商品互补的一种贸易联系。食盐、蔗糖、手工业品、土货产品等在与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中依然较为常见。从其他区域输入四川所需要的棉花、土布等商品,与长江中下游城市密切的商贸往来逐渐形成了长江流域整体市场。

从外部市场的层面上来看,自重庆开埠后,四川的市场被进一步打开,对外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根据海关贸易报告中统计的数据可以窥探这一时期四川对外贸易发展的情况。

表 1 1891—1911 年四川进出口贸易概况

单位:关平两

| 年份 | 进口 | | 出口 | | |
|------|------------|-----------|------------|-------|-------|
| | 洋货 | 土货 | 土货出口 | 土货复出口 | 洋货复出口 |
| 1891 | 1371 027 | 94 003 | 1 389 683 | | |
| 1892 | 5 825 474 | 399 146 | 3 021 117 | | |
| 1893 | 4 575 298 | 499 630 | 3 667 235 | 70 | 269 |
| 1894 | 5 114 013 | 669 804 | 4 997 688 | 298 | 818 |
| 1895 | 5 618 317 | 1 238 816 | 6 396 743 | | 104 |
| 1896 | 6 929 393 | 979 686 | 5 223 329 | 300 | 439 |
| 1897 | 8 444 081 | 2 776 468 | 6 751 258 | 297 | 134 |
| 1898 | 7 967 012 | 3 573 427 | 5 887 761 | 998 | 330 |
| 1899 | 13 075 176 | 3 884 726 | 8 832 775 | 24 | |
| 1900 | 12 918 073 | 4 541 948 | 6 993 037 | | 992 |
| 1901 | 12 598 741 | 2 555 333 | 9 114 476 | | 322 |
| 1902 | 12 886 075 | 3 156 137 | 8 659 092 | 1 076 | 489 |
| 1903 | 18 073 921 | 2 873 981 | 8 276 796 | 1 996 | 582 |
| 1904 | 14 689 635 | 3 764 764 | 10 952 028 | 617 | 1 844 |
| 1905 | 11 557 918 | 5 007 671 | 11 169 256 | 282 | 2 936 |
| 1906 | 14 823 670 | 3 285 614 | 10 892 126 | 1 254 | 3 950 |
| 1907 | 13 322 794 | 2 653 253 | 11 079 936 | 9 489 | 590 |
| 1908 | 13 872 332 | 4 318 565 | 12 990 098 | 23 | 7 562 |
| 1909 | 14 048 720 | 4 238 757 | 14 177 958 | 80 | 857 |
| 1910 | 12 546 820 | 4 271 019 | 15 490 974 | 180 | 2 630 |
| 1911 | 12 559 400 | 6 511 236 | 10 069 575 | 78 | 961 |
| 1912 | 7 819 009 | 7 976 859 | 11 078 507 | | 1 608 |

注:由各口岸进口洋货总数不在内。

资料来源: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G].民生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1936:16.

从表 1 可以看出,1891 年重庆开埠以来,四川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开关第一年进口洋货 1 371 027 关平两,1899 年突破千万关平两大关,进口洋货值达 13 075 176 关平两。1912 年进口洋货值较 1911 年少了 4 740 391 关平两,应当是辛亥革命爆发等因素影响所致,进口整体上处于增长的态势。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棉纱、棉布、煤油、五金矿石、鱼介海产、纸烟、染色及颜料等。以土货出口而言,开关之初基本上徘徊在 500 万关平两左右,1904 年始突破千万关平两大关,为 10 952 028 关平两。出口土货主要集中在生丝、猪鬃、药材、桐油、皮毛、五倍子等。土货复出口与洋货复出口在四川进出口贸易中由于数值微小,不再单做分析。

表 1 所统计的四川进出口贸易的数据系重庆关的贸易统计数据,说明四川进出口的商品很大一部分是经重庆关进口分销与集散出口。1917 年之后,四川进出口贸易值要加上万县关的数据才算完整。由此可以看出,重庆作为四川自有口岸,充分发挥了口岸调节进出口贸易的职能。进口货物首先到达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川东南市场,然后以此为据点分销四川各地。出口物资通过水路与陆路的方式,汇集川东市场,然后集中在重庆、万县出口,逐渐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川东南市场辐射川中、川西等地区的区域市场格局。重庆开埠以后,其在四川的经济与商业地位更加稳固,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其市场辐射能力较开埠前明显增强,不可否认重庆对附近州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重庆开埠以后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对外贸易的发展,其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四川境内地形地貌较为复杂,“川西平原区、川北浅坳区、川南微褶区”^{[39]314-340}。各区经济发展程度与生产方式等各不相同,尤其是川南、川西南、川西地区距川东较远,交通不便,仅凭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川东南市场很难辐射到这些地区的全部,影响较大的区域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水运沿线的商业城市,即乐山以上的大渡河、金沙江流域”^[40]。重庆进口的棉纱“主要是少数几个城镇的居民使用,这几个城市是重庆、泸州、叙府、嘉定,并且几乎全部为中产阶级购用”^{[41]185},其余地区会选择其他商道来解决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问题。比如,作为四川大宗出口的生丝,并不是全部以重庆为出口中心,有相当一部分选择沿边地区进行外销。“川南方面,由云南旱路运往腾越出口的生丝,最盛时达到 15 000 余担”^{[42]12},占四川生丝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最盛时可与重庆关出口的生丝平分秋色。其他土特产品如药材、牛羊皮、猪鬃等亦有选择沿边商道流向外部市场。经由沿边各关每年流入四川市场上的进口商品达数百万海关两,尤其是现代化交通方式出现以后(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这一现象更加明显。

可以从一些具体的实例中得出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市场的经济辐射力是有限的。

表 2 重庆开埠前后四川部分州县市场数

| 县名 | 重庆开埠前的市场数 | 重庆开埠后的市场数 | 增加数 | 增长率 |
|--------|------------|-------------|-----|-------|
| 双流(川西) | 14(1877 年) | 15(1894 年) | 1 | 7.1% |
| 三台(川北) | 39(1875 年) | 52(1911 年) | 13 | 33.3% |
| 乐至(川北) | 20(1883 年) | 24(1929 年) | 4 | 20.0% |
| 长寿(川东) | 31(1875 年) | 46(1911 年) | 15 | 48.4% |
| 丰都(川东) | 48(1891 年) | 75(1907 年) | 27 | 56.3% |
| 垫江(川东) | 27(1891 年) | 33(1900 年) | 6 | 22.2% |
| 江津(川东) | 73(1875 年) | 102(1924 年) | 29 | 39.7% |
| 丹棱(川南) | 9(1892 年) | 11(1923 年) | 2 | 22.2% |
| 名山(川南) | 17(1892 年) | 23(1930 年) | 6 | 35.3% |

资料来源:西川正夫.四川保路运动前的社会状况[G]//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第 45 册.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

据表 2 可以看出重庆开埠前后四川部分州县市场的变化情况。重庆开埠之后,三台、长寿、丰都的市场数增加超过 10 个。丰都增长最快,由 48 增加到 75 个,距离重庆较近的州县市场均有了不同程度

的增长。距离越远,其辐射力度相对来说就会越弱,位于川西的双流市场数近 20 年仅增加了 1 个。当然仅凭部分州县的市场变化很难说明重庆市场辐射范围大小的问题。下面可以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

表 3 清末金堂、新都两县商品来源及价值

单位:以银千两计

| 县别 | 省内商品 | 省外商品 | 国外商品 | 总计 |
|------|------|------|------|-----|
| 金堂县 | 250 | 20 | 30 | 300 |
| 新都县 | 206 | 40 | 40 | 286 |
| 两县合计 | 456 | 60 | 70 | 586 |

资料来源:根据《金堂县乡土志·商务》《新都县乡土志·商务》有关资料进行计算。

这里以金堂县与新都县的商品来源进行比较。两县商品来源主要集中于省内,省外商品与国外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占次要地位。新都县省内商品占比达 72.03%,金堂县的省内商品占比更是高达 83.33%,整体上来看,国外商品在市场流通所占的比重约在 12%左右。这个统计结果是成都下属两县,如果是更偏远的地区,国外商品的比重应该更低。仅以此两县的商品来源分析远远是不够的,可以借四川省内贸易做进一步的分析。

表 4 四川部分州县省内商品流通概况

| 州县 | 西充 | 江津 | 盐亭 | 新繁 | 新都 | 温江 | 蒲江 | 南部 |
|--------------|----|----|----|----|----|----|----|----|
| 输出商品销售省内州县数 | 17 | 21 | 5 | 6 | 4 | 16 | 10 | 15 |
| 输入的商品来自省内州县数 | 12 | 20 | 25 | 17 | 7 | 7 | 14 | 7 |

资料来源:根据所列州县清末乡土志数据进行统计。

据表 4 可以看出,西充、江津、盐亭、新繁、新都、温江、蒲江、南部以省内各州县之间的商品互通为主,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多数为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如蒲江县“输出的商品总值约 11.7 万两,主要有稻米、蚕丝、蓝靛、白蜡、桐炭、茶叶、竹木等。输入的商品总值 16.3 万两,其中鸦片、叶烟、蔗糖等农副产品约占 40%,绸缎、纸张等手工业品约占 36%,机制棉纱、棉布仅占很小一部分”^{[43]161}。新都县“输出的商品总值 53 万两,其中粮食 43.2 万两,占 81.5%,其余则是叶烟、牛羊皮、猪鬃等农副产品,输入的商品总值 30 万两,蚕丝、棉花等农副产品 14 万两,占 47%,盐、纸等手工业品 8.5 万两,占 28%,机制棉布、棉纱等工业品仅有 25%”^[44],可以看出省内各州县之间的商品流通占主要部分。

从另一方面来看,贸易环境发生变化时,会极大地削弱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市场对贸易的调节功能。在抗战时期,“长江航运之被敌封锁,西南、西北国际通道之开辟与夫各省间物资之交流转运等,均使四川省内之集散市场,形势为之转移”^[44],“结果遂形成若干新兴之贸易市场,除川东之重庆、万县外,如川南之泸县、宜宾、乐山、雅安;川西区之成都、灌县;川北区之南充、广元等地”^[44]。各中心市场(尤其是川南、川西南、川西)值此境况,遂选择其他商道经营本地区的对外商贸。

1932 年,淞沪战争爆发,长江航运受阻,四川贸易量下降,当年进出口贸易值 2 822 万关两,比 1931 年 5 239 万关两少 47%,连续三年下降。至 1937 年底和 1938 年 10 月,上海、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四川进出口贸易急剧下降,1938 年进出口值 1 932 万元,比 1937 年的 4 266 万元减少 55%^{[45]3-4}。

至抗战后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川南、川东南市场,辐射范围明显缩小,以棉花与棉纱为例进行分析,“棉花的销售区域,在抗战前本地占 20%,外埠占 80%,抗战爆发后本地占 60%,外埠占 40%”^{[46]30,65}、“重庆所需部分棉纱转向贵阳、昆明采购,上游大河区销量明显减少”^{[46]68-70},并且很大一部分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需要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市场进行调节。

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出海通道,固然是近代四川打破封闭格局的重要因素,但过度依赖单一出海通道,辐射力度有限,并且使四川市场外向型发展受制于长江中下游乃至国际市场的冲击。尤其在全面抗战时期长江航线阻塞时,单一通道的弊端迅速显现,逐渐丧失调节四川市场发展的作用。由此可以看

出,单维度的通道开放因辐射力度有限,无法惠及川省其他市场外向型的发展。在通道受阻时,这一现象更加明显。面对这一现状,四川构建南向开放的陆海新通道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西南沿边开放与川南外向型区域市场格局的开拓

西南沿边开放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开辟了一条贸易路线,而是四川构建了一条东向长江航道之外连接东南亚的战略通道。如果说重庆开埠开启了四川东向开放的通道,那么以宜宾为枢纽,经云南沿边各口岸连接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商贸网,则为四川真正意义上的南向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础。川省这一开放格局的演变并非区域贸易网络的简单延伸,而是四川对外陆海通道的建构。这一陆海通道以四川为腹地,宜宾为南向通道的枢纽,沿川滇交通线与西南国际交通线,经云南沿边各口岸对接仰光、海防等外部市场的陆海联运体系,正是当今西南陆海新通道西线主干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沿边开放之后,为四川南向开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四川要实现与沿边各市场以及外部市场(南亚、东南亚等)进一步的商贸互通,必须寻找一个南向开放的前沿阵地。以区位优势来看,“川南经济区既承接成渝,也辐射云贵北部,堪称成渝经济区脊梁,是四川南向开放,联系南贵昆和泛珠三角,进入东南亚的重要门户”^[47]¹。宜宾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沿边地区频繁的商贸往来,成为“川、滇、黔结合部最大的商贸中心和物资集散中心”^[48]。另一方面,从地理区位上看,“四川具有从陆上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三大市场中心枢纽的区位优势”^[49]¹⁴⁴。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宜宾更适合作为四川南向开放的重要节点城市。

宜宾作为四川南向开放的门户,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首先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宜宾“扼四川出入云贵、通往南亚之咽喉”^[50]²⁴。发展至清代,以宜宾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更加便利。“东线:宜宾城、金坪、象鼻、大观、芈山铺、富顺县、内江县、桫木镇、蒋家寺、李市镇、石燕桥、隆昌县、荣昌县、重庆府。南线:宜宾城、南广、月江、龙头、红桥、古宋、叙永厅,贵州毕节、遵义、贵阳。西线:宜宾城、三官铺、柏树溪、窠坝、安边、大滩、黑林子、书楼铺、福延、屏山县、马边厅、峨边厅、雷波厅、越隽厅。西南一线:宜宾城、南广、赵场、来复渡、庆符县、高县、云南盐津县、昭通、曲靖、昆明。西南二线:宜宾城、三官铺、柏树溪、窠坝、安边、大滩、横江、捧印村、燕子坡、云南盐津县。北线:宜宾城、打铁铺、永兴场、白花场、兴隆铺、双石铺、自流井、威远县、简阳、成都。”^[51]¹³⁷

至清代,围绕宜宾已经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以此为中心,东通重庆,南达贵阳,西南至昆明、盐津,西以广大川西为腹地,北上成都,成为附近省区的货物集散地。“地区所属各附近县,农工牧副业,土特产品皆汇集城市,上溯岷江犍、乐、成都雅安等地。沿金沙江上溯屏山、新市镇和横江、关河、老鸭滩,再转陆运至昭通、威宁、毕节以达贵阳、昆明等地。顺长江而下,可达南溪、江安、江津、渝、万、宜昌、武汉、直抵上海,畅通无阻,形成了以宜宾为中心的川西南市场”^[52]¹⁹¹⁻⁹²。

从四川南向开放的层面来看,宜宾既发挥着进口商品(沿边方向)分销的功能,又要将川南、川西南土特产品集中起来运至昭通、昆明转运出口。沿边各关海关贸易报告反映出凭子口单指销四川的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川南地区。1889—1902年,蒙自关与思茅关指销四川的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叙州、会理、建昌等”^[53]以宜宾为核心的川南、川西南地区。沿边开放以后,“云南帮在宜宾贩运棉纱、布匹等进口洋货”^[54]¹,然后再以宜宾为中心转运川南、川西南的其他市场。从四川土特产品南向出口来看,宜宾的集散功能进一步增强。

宜宾是猪鬃生货的一个集散市场,“除重庆集中洗制外,川东方面要算万县,川北方面要算南充,川南方面毗连云南,而云南鬃运宜宾,又兼川西方面的鬃部分运宜宾,每年集散三四十万吨之多”^[55]⁷²。金、岷两江和云、贵两省有几十个县区的山货药材和其他土特产品,“绝大部分运经宜宾中转,也是上述地区所需日用必需品的重要供应基地”^[52]⁸²⁻⁸³。其他土特产品亦在此集散,清末光绪年间,“川滇黔所产

桐油、药材、山货等商品,在宜宾集中交易”^{[52]69}。然后,大商号“从叙府南运桐油、五倍子、猪鬃、黄丝,经昆明转运缅甸、印度”^{[56]452}。总的来说,清代后期及民国年间,“宜宾城已成为川南物资集散地,云南贵州的山货、药材、水果,下江都市的百货、棉纱、花纱、五金电料,乐山、成都的绸缎,高县、庆符、长宁、珙县、筠连、兴文、南溪等各县的粮食、油料、茶叶大批涌入市场,集市贸易一度兴盛”^{[57]270-271}。

在抗战时期,宜宾作为集散中心的功能更加突出。1939年春,四川桐油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奉原行政院令,“规定四川桐油、丝蚕价格”,并指定“渝、万、叙、泸四处为桐油输出口岸”^{[58]116},其中宜宾的重要性已充分凸显出来。长江运输阻塞以后,“香港、上海、广州、印度、缅甸等地的货物,皆改道经海防、昆明运至宜宾,再转运长江下游重庆、万县以及湖北地区一带,宜宾顿时便成了外地迁来空袭避风港和新的进出口转运大港”^{[59]27}。随着“海防、西贡相继陷落,再由滇缅公路,陆路运来昆明,改交人背马驮运来四川”^{[59]63}。尽管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依然无法满足大量的战争物资与生活物品急需运输的需求,传统运输方式的马帮一时间成为运输的主力。1939年4月,叙昆驿运线开通,成为全国重要的驮运干线。当时在昆明的永昌祥、茂恒商号“率先来昆明站托运棉纱1350驮、茶叶38驮、匹头108驮、小百货98驮,共计1596驮,预定30天交运叙府。兵工署驮运汽油、柴油、铜饼、TNT炸药400驮”^{[56]452}。回程货物由叙府配给,“叙昆干线上很快出现了驿马对运的频繁运输现象”^{[56]452}。

1939年7月,总处副处长王炳南前来昆明视察,对昆明站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重庆市场上已有云南茶叶,还有缅甸进口的匹头、棉纱、军工物资铜饼等都是由昆明起运而到四川的,对抗日战争大后方起了很大的作用”^{[56]453}。

表5 1939—1945年由畹町出口物资情况表

| 出口物资名称 | 数量 | 备注 |
|--------|------------|--------------------|
| 桐油 | 84吨 | |
| 五倍子 | 75吨 | |
| 猪鬃 | 9吨3000公斤 | 物资由叙昆线运至昆明由资源委员会转运 |
| 黄丝 | 3吨300公斤 | 到缅甸仰光、印度加尔各答 |
| 药材 | 1吨400公斤 | |
| 合计 | 172吨3700公斤 | |

资料来源:马廷璧,黄恒蛟.云南战时驿运[G]//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459.

表6 1939—1945年由畹町进口内运物资情况表

| 品名 | 数量 | 备注 |
|------|-----------|---------------------------------------|
| 兵工物资 | 20002.4吨 | |
| 棉纱匹头 | 87.5吨 | |
| 小百货 | 6吨 | 由兵工署托运至昆明,永昌祥、茂恒及云兴银行(光文银行)由叙昆线马帮运至叙府 |
| 云南茶叶 | 2.3吨 | |
| 合计 | 200098.2吨 | |

资料来源:马廷璧,黄恒蛟.云南战时驿运[G]//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459.

根据畹町进出口物资情况表可以看出,1939—1945年经由叙昆线运输的出口物资达173吨,输入的进口物资200098.2吨。出口物资先集中宜宾,然后沿叙昆线运至昆明转运出口。进口物资由昆明沿叙昆线运至宜宾,然后“大量进口物资通过叙昆干线驿运叙府后转川江航运,运至重庆以及四川其他地区”^[60],宜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以宜宾为核心的川南、川西南地区也有其他驿运路线,比

如泸昆线亦承担部分运输,其运输路线的长度 1 120 公里,相较于叙昆线运输长度 610 公里为远。形成了叙昆线为主,泸昆线为辅的运输布局。

同时,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亦沿叙昆线通过马帮驮运的方式输送进出口物资。如国民政府需利用桐油偿还 3 000 万美元的贷款,由汽车运送桐油经滇缅公路至仰光出口,无法满足其桐油输出的要求,“遂在叙府设置储运站,一方面加紧收购桐油,另一方面赶制适合驮运的木桶装油,交由交通部叙昆驮运管理所,承运至昆明,然后再转运出口。仅 1939 年 4 月至年末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贸易委员会交由驮运管理所运送到昆明的出口物资达 1 000 余吨”^[60]。当然,这只是马帮驮运的数量,在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停止运输以前,其运送量要远大于此,说明这一时期宜宾为四川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以及支援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的其他市场亦发挥着重要作用。泸州处于长江、沱江的合流处,“历来为川南、滇东、黔西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61]342},并且为“宜宾、重庆、自流井、贡井、资中输出入商品之转运地”^{[62]76},有“天生重庆,铁铸泸州”^[63]的美誉。抗战爆发后,沿边各关成为大后方与国际联系的重要交通要道。国民政府遂决定从四川经云南与外部市场取得联系,修筑川滇东路与滇缅公路,途经“隆昌、泸州、叙永、毕节、威宁、曲靖、昆明、大理、芒市、畹町入缅甸的南坎、八莫等镇”^{[64]408}。此一路段“较由重庆经贵阳而至昆明,短 240 公里”^{[58]116},交通更为便利。战时的战备物资与生活物品沿这条路线从缅甸输入泸州,在兰田坝卸货,然后由水路或者陆路分销大后方及前线阵地,成为后方以及四川各地进出口物资的重要据点,一度成为“桐油输出的重要口岸”^{[58]116}。1938—1945 年,经由该路线,“年输出大米 21 万石、蚕豆 3.7 万石、小麦 1.6 万石、大豆 1.1 万石、菜油 100 万市斤、桐油 6 万市斤,主要销往自贡、内江、合川、重庆、万县、宜昌、汉口等地;年输出猪鬃 20 万市斤、羊毛 6 万市斤,销往重庆、上海;年输出桂圆 40—60 万市斤,销往湖北、贵州以及省内各县;药材每年输出 1 500 吨”^{[61]343}。

乐山“位于岷江与大渡河、青衣江交汇处,三面连水,一面连路,交通便利,工商发达,被称为上川南重镇”^{[65]1}。川滇西路“由乐山至西康的西昌,再经会理至云南大姚、祥云接滇缅公路”^{[66]216}。“峨眉之蜡、丝、黄连,雅安、洪雅之竹木、药材,新津、崇庆一带之油、麻,江津、犍为之酒,宜宾、南溪之糖”^{[66]216},多以乐山为集散中心。战时乐山具有经沿边各关运销生丝的便利,“合川分处曾以仓存大车丝全部运渝后,经四川分公司直接运往乐山分处制炼”^[67]。上川南地区的生丝,“十分之一运至成都附近各地销售,其他十分之九,则专销乐山”^[68]。集散生丝最盛时,“每年约有六七千担”^{[66]24}。生丝除少量自销外,大部分用来外销,“1933 年产量增至 3 000 余担,主要销往上海、缅甸,自 1930 年之后主要以缅甸为主销地”^[69]。其他商品,“桐油、棓油和白姜、黄姜、黄连等药材,茶叶、蚕丝、白蜡部分转云南出口。进入 30 年代,中药材外销达 30 多个品种,一般年销白姜 900 多市担、黄连 1 010 多市担,蚕茧最高年销 8 万市担,茶叶 1.2 万市担,白蜡 8 万多市担,桐油 1.5 万多市担,棓子油 4.2 万市担”^{[66]194}。1937 年下半年,“乐山进出口贸易值达 3 295 771.86 元”^{[70]462-463}。

内江地处沱江中游,与资中互通有无,以此达金堂之赵家渡。沿此而下,则与富、泸一带物产互相调剂,又居成渝公路的重要节点,“渐成货物流通枢纽”^{[62]76},周边货物多由此集散,行商较为活跃,转口贸易的功能较为突出,是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沿边开放以后,为四川南向开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沿边各关以及各市场成为四川与外部市场沟通的重要据点。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市场,成为四川承接沿边口岸进出口货物的重心,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以后,这种转变更加明显。四川市场结构在沿边口岸的调节作用下,逐渐发生了空间上的变化。若单以四川南向开放的层面来看,以宜宾为中心的川南、川西南区域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就好比四川东向开放中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市场所占据的地位那样重要。

四川在沿边开放之后所形成的这一市场结构的变化,并非仅仅服务于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市场与以宜宾为核心的川南市场,而是由川东、川南两个区域市场共同辐射到四川其他市场。研究这两个外向

型区域市场对进口商品的分销以及土特产品的集散便会发现,四川其他市场土特产品的流向主要是东向流入川东市场,南向流入川南市场,然后有序地进入外部市场。进口商品则遵循就近原则,流入各自市场所辐射的地区。相较于沿边开放之前,四川的市场结构布局更趋合理,开放的程度更高。

近代川南外向型市场的开拓,并非简单的区域市场格局的重塑,而是四川构建通向东南亚的南向陆海联运通道的早期尝试,尤其是抗战时期四川东向长江航道被封锁,南向陆海通道作为物资进出口的重要生命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近代以来,伴随着沿海、沿江口岸的开放与对外贸易的发展,四川市场逐渐由内向型结构转变为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格局。以重庆为核心的川东、川东南与以宜宾为核心的川南、川西南区域,在长江航线与西南沿边开放构筑的陆海通道的驱动下,形成了辐射全川的外向型市场体系。这一市场格局的形成对近代四川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能,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市场格局,增强了区域经济与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的联系;外向型商贸的拓展带动了相关产业与商品化农业的发展,亦促进了商业信息的流通与观念的更新,为四川经济的近代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在建设“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2]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重庆乃至四川应进一步汲取历史经验,发挥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枢纽作用,加强推动南向通道的建设,尤其是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干线重要省份云南的联动,将历史时期形成的川滇缅印经济走廊,建设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开放新前沿。在此基础上,重庆乃至四川将成为对接“一带一路”内外联动的重要战略枢纽,其外向型市场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势快速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郑敬斌. 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N]. 光明日报, 2024-04-30(2).
- [2]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Z]. 2019.
- [3] 从一张纸到国际大通道——陆海新通道诞生记[N]. 杨骏, 整理. 重庆日报, 2025-11-03(3).
- [4] 徐蕴. 近代长江上游港口腹地经济关系研究[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2.
- [5] 朱绍祖. 开埠通商前后四川药材市场的嬗变及影响[J].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22(3): 32-41.
- [6] 张瑾, 全瑞中. 重庆开埠前后四川乡村手工业的嬗变与农村集镇的发展[J]. 湖北社会科学, 2019(6): 81-87.
- [7] 林文勋, 马琦. 近代云南省际贸易研究[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1(4): 102-113+150.
- [8] 和乐乐, 张永帅. 近代西南沿边开放与四川生丝外销格局的重构及其空间变化(1889—1945)[J]. 丝路文化研究, 2025(1): 104-120.
- [9] 刘森林. 巴蜀场镇[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 [10] 方行. 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J]. 历史研究, 1987(6): 78-93.
- [11] 王笛.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2] 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史建云, 徐秀丽, 译. 虞和平, 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3] 乡镇[M]//广安州新志: 卷 9. 刻本. 1911(宣统三年).
- [14] 方輿[M]//乐山县志: 卷 1. 铅印. 1934.
- [15] 高玉凌. 乾嘉时期四川的场市、场市网及其功能[G]//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清史研究: 第 3 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 [16] 张学君, 张莉红. 成都城市史[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 [17] 食货[M]//龙安府志: 卷 3. 刻本. 1842(道光二十二年).
- [18] 许檀. 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其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3): 191-202, 207.

- [19] 根岸佶. 四川贸易谈[J]. 金沙, 译. 四川杂志, 1908(2): 83-95.
- [20] 周洵. 蜀海丛谈[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5.
- [21] 隗瀛涛. 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3.
- [22] 宋家泰. 城市——区域与城市区域调查研究[J]. 地理学报, 1980(4): 277-287.
- [23] 彭通湖. 四川近代经济史[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
- [24] 张莉红, 张学君. 成都通史: 卷6 清时期[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
- [25] 风俗[M]//成都县志: 卷1. 刻本. 1860(咸丰十年).
- [26] 礼俗[M]//华阳县志: 卷5. 铅印. 1934.
- [27] 马尼爱. 游历四川成都记[J]. 经世报, 1987(5): 5-11.
- [28] 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
- [29] 龙登高. 西南丝路华侨经济的历史分析[G]//萧效钦, 李定国. 世界华侨华人经济研究.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6.
- [30] 费尔南·布罗代尔. 资本主义的动力[M]. 杨起,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 [31] 何泉达. 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资料选辑[G].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
- [32] 王钰欣. 清代前期手工业经济的性质与特点[G]//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33] 彭泽益.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 第1卷[G].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4] 课税[M]//巴县志: 卷3. 刻本. 1761(乾隆二十六年).
- [35] 罗澍伟. 近代中国的区域与城市[G].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城市史研究: 第11—12辑.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 [36] 周智生. 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37] 郑维宽. 清代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市场问题初探[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 30-34.
- [38] 陆远权. 重庆开埠初期四川外贸市场的总体特点[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2): 265-269.
- [39] 郑励俭. 四川新地志[M]. 南京: 正中书局, 1946.
- [40] 刘方建. 1937年前四川近代工业发展迟滞的原因[J]. 财经科学 1985(5): 51-58.
- [41] 周勇, 刘景修.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1876—1949[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 [42] 江昌绪. 四川省之主要物产[M]. 南京: 民主实业公司经济研究室, 1936.
- [43] 彭朝贵, 王炎, 谢放. 清代四川农村社会经济史[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1.
- [44] 章友江, 李延栋. 抗战以来四川之对外贸易[J]. 四川经济季刊 1943(1): 52-63.
- [45]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 [46] 杨蔚, 陈敬先. 重庆棉货市场及市价之研究[M]. 重庆: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所编印, 1944.
- [47] 李海. 川南—四川崛起的新兴增长极[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3.
- [48] 凌受勋. 清代、民国时期水码头宜宾的商贸和物流——基于档案史料的考察[J]. 宜宾学院学报, 2015(4): 37-45+111.
- [49] 张红伟, 耿林, 王芳. 四川对外开放战略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 [50] 宜宾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宜宾文史资料选辑: 第24辑[G]. 四川省宜宾市政协协商委员会, 1996.
- [51] 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 宜宾市地方志办公室. 宜宾城的2200年[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 [5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宜宾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宜宾文史资料选辑: 第7辑[G]. 宜宾印刷总公司, 1989.
- [5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 中国旧海关史料: 第16册[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1.
- [5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宜宾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宜宾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G]. 宜宾印刷总公司, 1994.
- [5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宜宾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 宜宾市文史资料选辑: 第4辑[G]. 宜宾印刷总公司, 1962.
- [5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 抗战时期的西南交通[G].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57] 四川省宜宾县志编纂委员会. 宜宾县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1.
- [58] 孙文郁, 朱寿麟. 四川桐油之生产与运销[M]. 成都: 金陵大学农学院, 1942.

- [5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宾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宜宾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G]. 宜宾印刷总公司,1990.
- [60] 陆韧. 抗日战争中的云南马帮运输[J]. 抗日战争研究,1995(1):59-69.
- [61]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志·商业志[M].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 [62] 四川省政府. 四川省概况[M]. 成都: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发行,1949.
- [63] 梁有烈. 川滇公路纪行[J]. 旅行杂志,1940(9):25-33.
- [64] 何一民,艾智科,王肇磊.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
- [65] 乐山县政府. 乐山史志资料丛书——四川省乐山县概览[G]. 内部资料,1987.
- [66] 干鸣丰. 乐山城市史稿[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67] 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复兴商业公司成都办事处关于生丝不合外销缫丝验收收透支给款生丝接收外销蚕茧收购改正填报错误的函电磅码单[A]. 档号. M105-001-000123-0001.
- [68] 重庆中国银行. 四川绸缎丝业调查[J]. 四川月报,1936(3):93-97.
- [69] 二十五年各地商业调查概况[J]. 四川经济季刊,1937(4):32-40.
- [70] 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 乐山史志资料(1991—1992)[G]. 内部资料,1992.

From Closed to Ope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Sichuan's Outward-Oriented Market under the Driving Force of Bilateral Ports in Modern Times (1891—1945)

He Lele¹ Lu Yu²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Historical Culture,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Anhui 247000;

2. The Memorial Hall of the War to Resist U. 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Dandong Liaoning118000, China)

Abstract: Sichuan is a typical inland province, and its markets before modern times exhibited obvious inward-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The circulation of goods in the market was mainly regional exchanges of local products, gradually forming a single circulation system dominated by essential living supplies such as grain and salt. After the opening of ports to trade, under the transmission effects of external markets and trading ports, the structure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in Sichuan was reshaped. A bilateral circulation system of local and foreign goods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one-way cycle,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Sichuan's economic outward orientation and becoming the main trend in market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 Sichuan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regional market network with Chongqing and Yibin as dual cores, relying on the Yangtze River channels and various ports along the southwest border. Among them, the Eastern Sichuan market, centered on Chongqing, drove eastward openness, while the Southern Sichuan market, centered on Yibin, led southward openness, jointly radiating the market pattern to other regions of Sichua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dual cores broke the traditional closed market pattern, advancing Sichuan's outward-oriented market to a more open stage.

Keywords: opening of ports to trade; outward-oriented market; commodity structure; land and sea channels

[责任编辑:陈忻]